

近代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台湾中原大学 魏外扬

19世纪素有“宣教大世纪”之称，欧美基督新教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士远赴异邦，传扬福音，而其副产品则是中西文化之交流。英籍牧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近代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于1807年来华，1834年病逝于广州，埋葬于澳门，墓碑上特别推崇他生前的三大文化伟业：译圣经、编字典、办学校。本文就这三方面，略述马礼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153

一、译圣经

马礼逊来华的首要使命就是学习中文并将圣经译为中文，经过十二年的努力，在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牧师的协助下，包括旧约与新约的全本圣经，终于在1819年底译成。手稿送到马六甲英华书院，以传统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制，于1823年完成，命名为《神天圣书》，并由马礼逊带回英国，亲自呈献于英国圣经公会1824年的年会中。然而，这并不是英国圣经公会年会中出现的第一本中文圣经。在前一年(1823年)的年会中，住在印度的英籍牧师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所主持翻译的中文圣经已经送到英国，拔得圣经中译史上的头筹。

为了完成译经大业，马殊曼花了十六年的时间，马礼逊也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两人投入的心力、劳苦都不容置疑，但由于秉持的理念不同、身处的环境不同，他们译本呈现的风格颇为不同。以诗篇第二十三篇为例，马殊曼是这样译的：

耶贺华为我牧 我将靡缺

其令我卧在青草处 引我至水际
救返我魂 为厥名而导我进善义之路
虽我游通死影之谷而不惧祸害 因尔偕予 尔棍与杖慰予耳
尔当仇辈之面而备一席我前 傅油我首 我爵满溢
我一生恩泽固从我 我将永在耶贺华之堂也

再看马礼逊的译文：

神主为我之牧者 故我未致受缺
其使我安偃在绿草田内 其又携我走于静水之边也
其使我心归于好处 且为厥名其携我行于义之路也
又也 我虽行通死影之谷 我尚不惊惧 盖尔偕我焉 尔杖与尔棍扶
我起矣
在我敌之面前尔为我而置一桌 尔以油傅我首 我爵满而溢也
固然恩与慈将随我于我命之诸日 又我将居在神主之家至永远矣

两者相较，都未脱离原文原义，但很明显可以看出，马殊曼用字较少（100个字），且较为艰涩，马礼逊用字较多（136个字），也较为流畅。盖因马礼逊一向主张，圣经不是为少数学者而译，而是为多数民众而译，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文体就是像《三国志》那样，不会令学者嫌弃，民众也不会视为畏途，也就是雅俗共赏，琅琅上口。

马礼逊一面译圣经，同时也编字典，而为了进行这两大学术工程，他从1807年来华之初，就开始不间断、不惜代价地搜购中文图书。当他在1823年底初次返回英国述职时，将大约一万本中文线装书带回英国，这批中文图书几经迁移、略有散失，目前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图书馆典藏，这就是所谓的“马礼逊文库”（Morrison Collection）。

有学者认为，马礼逊文库中虽无特别难得的图书或版本，但是合在一起来看，无论在当时或今日，都具有很高的价值。第一，马礼逊买书是为了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文库图书所涵盖的领域广大，除传统经典名著外，也有民间通俗作品。第二，马礼逊与中国传统的收藏家、鉴赏家不同，他买的多半是当时流通的版本，也就是乾隆、嘉庆两朝的版本。时至今日，这些当时行家们所不屑一顾的版本，反而成了稀有的东西。

以马礼逊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买书、藏书决不是闲情雅事，而是一种暗中

冒险进行的事情。由于洋人的行动受限制,马礼逊只好委托华人代办代买,虽然明知为他买书的华人上下其手、借机图利,他也别无选择只好甘愿受骗。为了买书花费大,马礼逊不惜过更简陋的生活,直到他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收入大幅提高,才能应付愈来愈大笔的图书费用;而在当时极端排外的政策下,洋人拥有大量的中文图书自然会引人猜疑,因此马礼逊谨慎行事,时刻处在惊恐之中。即使是在澳门,他也不时要将身边的书籍藏好,以防清吏发动突击检查。

马礼逊用功读书的程度,实在令人敬佩。在一本读书手札中,他记下从1818年底到1819年初的读书心得。在这几个月中,他读了包括英文、拉丁文与中文的几种书籍,例如英译的希腊史诗《埃利奥特》(The Iliad)、古罗马诗人霍勒斯(Horace)的作品、朱熹的《论语集注》与毛宗岗增补的《三国演义》。马礼逊很欣赏《三国演义》的文体,主张为了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翻译中文圣经最好也采用类似的文体。

马礼逊译的中文圣经已在1819年底完成,因此他在1823年回国时,决定将他私人的中文图书馆搬回英国,希望藉此带动英国研究汉学的风气,不料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这些线装书好不容易历时三个多月飘洋过海来到英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巨额的关税,非马礼逊所能承担。经多方陈情、有关人士力说,公文来回数月之久,海关当局才准予免税放行。第二个挫折是马礼逊心目中最佳的两个捐赠对象,牛津或剑桥大学,竟然都兴趣缺缺,反应冷淡,这批远道而来的图书只好暂时存放在“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仓库中。直到1823年,新成立不久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才接受捐赠,并如约设立汉学讲座,由曾任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的修德牧师(Samuel Kidd)主持。这批图书在此定居八十多年后,1922年又迁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直到今日。在此期间,马礼逊文库被打散与其它中文图书混编在一起,逐渐失去其特色与价值。直到1996年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之下,进行一次最新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不但出版了《马礼逊文库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也重新将它们集合陈列,以便学者参考使用。至于马礼逊在华第二阶段(1826—1834)所搜购的中文书籍,目前则由香港大学典藏,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学术遗产。

二、编字典

马礼逊字典的英文名字是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分为三部分、六大册,合计将近五千页。第一部分中文名为《字典》,是按部首排列的汉英

字典,共有三册。第二部分中文名为《五车韵府》,是按声韵排列的汉英字典,占两册。第三部分是按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汉字典,只有一册。

其实马礼逊最初的构想,还不仅是编一部字典,而是编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辞典。以第一部分第一册的第一个字“一”为例,他的解说与例句如下:

第一 “Order one,” i. e. the first.

同一般 or 一样 “The same as.”

都是一样 “It is all the same, or they are all alike.”

画一 “To draw one line.” i. e. to reduce all to the same rule. To place in order.

不能画一 “The same cannot be affirmed of all; or they cannot managed alike.”

好语似珠穿一一 “Good sayings are like pearls strung one by one.”

一个人 “A man.”

一口水 “A draught of water.”

视色事如鸩毒一入口即立死 “View illicit pleasure as you would poison, which, as soon as it enters the mouth, causes instant death.”

专一 “Application to one object, undivided attention.”

一心 “One heart,” i. e. the whole heart.

一生 “The whole life.”

一总 and 一概 and 一切 All denote the whole number of persons or things; there is, however, a peculiarity in the use of each.

不能一概而论 “Cannot affirm the same of all.”

(未完,下略。)

后来因为进度太慢,到了第一部分的后两册,就只有简单地解释字义而已,不复有大量搜集词句的情形。有学者评论说,中国传统字书中的例句,都从经史文献而来,较少俗语俚语,马礼逊字典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收录了大量的日常用语,保留了属于民间的事物与观念。

印刷出版这套皇皇巨著也是个难题,幸而东印度公司极为肯定这部字典的价值,不但提供印刷的资金,还由英国派专人到澳门来主其事。全部字典终于在1823年印妥,四开本,印制七百五十套,除公司留下一百套外,其余六百五十套都归马礼逊所有。马礼逊除将一部分赠送教会、亲友外,其余的则委托英国、法国、

印度、马六甲、澳门等地书局或朋友销售。每套定价二十英镑，这虽然不是一笔小钱，但出版三年以后，存书不到五十套，可见销售状况还相当不错。此外，在他身前，这套字典已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管道。

除了这部字典，马礼逊对于中国语文还有其它许多贡献，例如他著有《通用汉言之法》，这不但是马礼逊最早的中文著作，也是第一本有关中文文法的专书。他还编了《广东省土话字汇》，则是一本广东话的字典，有助于外国人与当地人的沟通。

三、办学校

马礼逊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当他日复一日在广州、澳门，埋首于编字典、译圣经之时，已经想到在东南亚设立一个传教基地，如此在等候中国门户开放的时候，也可以着手进行许多准备的工作。米怜牧师的来到使这个构想得以实现，1815年米怜、梁发等人进驻马六甲，而英华书院也在1818年创立。

英华书院的规模虽不大，却有崇高的理想，是以沟通东西文化及实现全人教育为目标。马礼逊、米怜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相当了解与尊重的传教士，所以这所学校收中国学生，也收外国学生，学习的课程有中学，也有西学。它不是一所狭义的神学院，而是以成为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为目标的学习基地。对于这种比较自由开放的文化、教育理念，他们所属的母会难免有些犹疑，所提供的支持也有所保留，因此马礼逊个人的捐赠，才是学校得以成立与维持的主要原因。

马六甲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立，到1843年迁往香港，根植马六甲的时期为25年。前后七任校长，皆为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依序为米怜、宏富礼、高大卫、修德、汤雅各、伊云士及理雅各。其中多半也具有汉学家的资格，例如高大卫(David Collie)翻译四书；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四书五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学大师。

书院的教师，西学皆由传教士担任，中学则由华人学者担任。除这两大学术系统外，也聘请马来文、泰文、越南文、甚至日文的教师，充分表现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特色。学生主要来自马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人数不多，初创时只有七位，以后维持在二、三十位，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位。学生年龄并无严格限制，有一份名录显示，从十三岁到三十五岁都有。西籍学生不多，但像后来出任校长的宏富礼、高大卫等人，也曾出现在学生名录中，可见有教无类是书院的一大原则。马六甲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但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华人中绝大部分以闽

南语为母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米怜的共识:这所学校是为中国、为将来而设的。

马六甲时期的英华书院,栽培出不少杰出的校友,华人、西人都有。华人校友,如梁发是第一位华人牧师,也是华人撰写传教文章的先驱;何进善是第二位华人牧师、香港名人何启的父亲;袁德辉是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西人校友,如宏富礼、高大卫先后担任母校校长;美国人亨德投身中外贸易,并著《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为早期中外关系留下珍贵纪录;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是马礼逊的儿子,克绍箕裘,可惜英年早逝。

书院中除教学设备外,最重要的就是印刷部门。英华书院中有许多员工全力投入印刷工作,印中文的,也印英文的、马来文的书刊。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早在书院成立前的1815年就按月出刊了。马礼逊、米怜合作译成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当然更是书院最荣誉的产品。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华书院于1834年迁往香港,1844年改为英华神学院,办学理想与性质已与马礼逊、米怜领导时期有异,终于在1856年停办。停顿五十多年后,1913年仍在香港复校,直至今日。其实,除了香港英华书院直接承袭马礼逊的办学理念外,后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好几所以英华为名的学校,也可视为马礼逊精神的延伸。如厦门鼓浪屿的英华、福州的英华,都为中国近代教会与社会培育出无数人才。

参考文献: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汤森(William J. Townsend)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版。

Brian Harrison 著,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香港大学出版,1979年版。

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